

汉文西夏地图文献述要*

胡 玉 冰

汉文西夏地图文献是中国汉文古地图文献中颇具特色的一类,它对于研究西夏国地理和中国中古时期地图文献的特点都有史料价值。汉文西夏地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汉文西夏地图特指西夏专题地图;只要标绘有西夏地理信息的地图我们就称之为西夏地图,是为广义的汉文西夏地图。由于汉文西夏地图文献绝大多数都已亡佚了,为了解此类文献之全貌,本文所述之“汉文西夏地图”用其广义。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于亡佚和传世的西夏地图文献都略加考述,希望能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宋朝重视绘制西夏地图文献的原因

一般来说,地图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需求及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北宋立国之初,内忧外患迫使其要详细了解对手的国情。绘制地图是了解对方地理情况的最直接的手段。宋朝运用一套特殊的地图符号系统来图绘西夏国的山川城寨,并借助简明的文字标注来辅助说明,所绘地图的军事意义非常明显。

宋人尹洙在西夏攻宋期间,曾在御夏最前线参与抗夏作战,所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项目编号:04BJQ012)的阶段性成果。

以深切体会到地图在御夏战争中的重要性。在《河南先生文集》卷二三《按地图》中，尹洙谈到：“则知图牒之典，历代为重。国朝自继迁之叛，弃磧西之地，年祀已远，图书亡逸，故其道里之迂直，山川之险易，世人罕有详悉者。……朝廷图任诗书之将，调发精锐之卒，副以属国羌胡、边城射士、塞上之兵，不下二三十万。然而限以流沙之阻，山川回远，莫敢进军。故未能拔朔方之城，馘元昊之首，使其游魂于疆场之外者，几一年矣。近者王文忠、潘湜失利，皆以不知山川险易，为其邀击。此不按地輿之失，非战士材武之劣也。昨闻屯田员外郎刘涣曾进西鄙地图，颇亦周备。平夏图牒，秘府及民间当有存者。伏望博加求访，命近臣参较同异，形于绘素，而颁之于边将，俾其见利则按图而出师，寇出则分兵而守险。此御戎之急务也，惟陛下留意焉。”^①尹洙从分析西夏国特殊的地形地貌入手，提醒宋仁宗，宋军在对夏作战中的几次失利，原因就在于宋将不熟悉西夏山川险易。从尹洙的叙述可以看出，宋朝原来就藏有西夏地图，但图中反映的地理信息不能适应战争的最新变化，所以尹洙极力主张，现在应该着手搜集散在官府和民间的西夏地图，再结合最新情况，绘制新的反映西夏地理情况的地理图，把它们颁发给御夏前线的将领，让他们据地图标示出的信息决定是出兵还是据守。

正是由于军事实战的需要，使得一批与西夏有关的地图相继产生，并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时候西夏地图还是宋朝对夏政策中的决定因素。孙路劝止司马光放弃河、湟就是典型的例子。《宋史》卷三三二《孙路传》载：“司马光将弃河、湟，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光亟召问，路挟輿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②在宋夏战争中，宋军有时就是通过地图提供的信息，及时调整先前制定的战术，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如《宋史》卷四八五《夏国

传》载,咸平六年(1003)六月,李继迁“复以二万骑围麟州,诏金明巡检李继周击之。围未解,麟州部署请济师,真宗阅地图曰:‘麟州依险,三面孤绝,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忧耳。’”^③于是果断决定立即派出援军。战事的进程果然如真宗所料,西夏太祖李继迁率夏军占据了供应麟州用水的水寨。正是由于宋朝援军的及时到来,知州卫居宝不失时机地出奇兵,最后终于解了麟州之围^④。

二、宋朝西夏地图文献的掌管

宋朝主要由军事机构的官员掌管地图。《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记载,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图籍,以周知方域之广袤,及郡邑、镇砦道里之远近。”^⑤地图由兵部下属的机构来掌管,一方面体现了地图的机密性,同时也体现了地图所具有的特殊的军事价值。从宋朝职官制度来看,地图虽然是由军事机关专管,但掌管的机构却不只兵部一家。

宋朝主管军事事务的最高机关是枢密院,尚书省兵部的许多军事职权都被枢密院侵夺。就地图的掌管来看,也是如此。《玉海》卷十四《地理·地理图》之[景德]《山川形势图》条载:“四年七月戊子,诏翰林,遣画工分诣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里远近,纳枢密院。每发兵、屯戍、移徙、租赋,以备检阅。”^⑥同卷之[祥符]《山川城寨图》条载:“三年四月,先是,曹玮、张崇贵上《泾原环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己未,上出以示王钦若等,曰:‘处置得宜,储备详悉。华夷山川城郭险固、出入战守之要,尽在是矣。’宜令别绘二图,用枢密印,一付本路,一留密院,令诸将按图以计事。”^⑦可见在宋真宗时期,枢密院已经成为掌管地图的主要机构了。枢密院的官员也非常重视对地图的完善和管理,并且经常研究地图,如同卷之[元祐]《职方图》条载:“嘉祐五年,欧阳修为枢副,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阙屯戍者必加蒐补。”^⑧

枢密院对地图的重视,纯粹是出于军事目的。[景德]《山川形势图》的主要用途就是供决策者在军队发兵、屯戍、移徙的时候参考,而《泾原环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更有利于军队制定具体的行军作战战术。因为“出入战守之要”尽在图中,所以最高当权者明令诸将官,要按地图所反映的情况来决定军队的军事行动。正是由于地图所具有的军事意义,仁宗嘉祐五年(1060),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副长官的欧阳修上任伊始,就和枢密院长官枢密使曾公亮一道,精心编制地图,对那些有着特殊军事意义的边境地区更是格外关注。

三、亡佚的西夏地图文献

西夏地图文献在宋朝成图数量不少,但在当时流传就不广,传至今日的就更少了。郑樵在《通志·图谱略·记有》中著录的《西夏贺兰山图》,是目前所知的宋人目录书中明确著录在宋朝仍然传世的唯一一幅西夏专题地图。该图在宋以后就亡佚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传世的《西夏地形图》来推知其绘制的内容。

在传世的《西夏地形图》中,贺兰山地区标注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自然地理方面,图上标明贺兰山“有谷道九条”,这些谷道平时是贸易交通要道,战时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人文地理方面,在横涧谷、前石门口、后石门口三条谷道之南标注为“西夏祖坟”,还有“木栅行营”、“夏贼逃所”。从木栅行宫往西依次标注为五台山寺、卧家庄、卫间殿、贺兰池(池名下注作“眉泉九十九眼”),这些地方对西夏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五台山寺为皇室礼佛念经的寺庙,贺兰山池则是非常重要的水源地。尽管郑樵著录的《西夏贺兰山图》已失传,但我们可以推知,《西夏贺兰山图》中肯定包括上述《西夏地形图》中贺兰山地区标注的所有内容,而且从郑樵所录的地图名称看,既然是西夏时期贺兰山地区的专用图,它所标注的内容肯定比《西夏地形图》的更丰富。

在宋朝还有一些地图,虽然不是西夏国专题地图,但整合这些地图中提供的地理信息,还是可以有助于对西夏地理情况的了解的。《玉海》卷十四《地理·地理图》之《至道滋福殿观地图》条载:“咸平四年十月庚戌,上以《陕西二十三州地图》示辅臣,历指山川险易、蕃部居处,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陇山之外,号为富庶,且与羌戎接畛,已命张雍出守,冀其抚绥有方。’次指殿北壁《灵州图》曰:‘此冯继业所画^⑨,颇为周悉。山川形胜如此,安得智勇之士为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沙、伊、凉等州图》曰:‘此图载黄河所出之山,乃在积石外,与《禹贡》所术异。’又指北壁《幽州北契丹国界图》载契丹所据地,南北千五百里,东西九百里,上曰:‘封域非广,惜燕蓟之沦异俗也。’时郑文宝亦献《河西陇右图》,且言灵州不可弃^⑩先是,八月戊申,上出《环庆清远军至灵州地图》,指示辅臣,又指灵州西榆木天涧路,且议战守方略。”^⑪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在滋福殿中与群臣所论之图多与西夏有关。将这些地图中所反映的西夏地理信息综合在一起,就可以拼凑出一幅内容丰富的西夏国地图了。

《陕西二十三州地图》虽然以宋朝陕西的二十三州山川地理为绘制的主要内容,但由于陕西在宋夏战争中处于最前线,所以图中一定有西夏与宋陕西路接壤地区边界情况。

《灵州图》是宋太祖时期冯继业所献。灵州(遗址在今宁夏吴忠市东塔寺乡附近)历来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接地带的一个区域中心,宋夏时期原属宋朝,夏太祖继迁攻取灵州后,遂定夏州割据政权的首都于此,改灵州名称曰西平府,直到1020年,夏太宗德明才将夏州政权的首都迁往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并改称怀远镇为兴州。但灵州依然是地位仅次于兴州的重镇。继迁定都于灵州后,肯定会精心经营其地,灵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都会有所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冯继业献上的《灵州图》相当于西夏国的州郡专图,对于宋朝了解西夏国灵州的地理情况依然会有很大的帮助。

《甘、沙、伊、凉等州图》对于宋朝了解西夏国河西之地有很大的帮助。夏州政权定都灵州后,开始积极致力于河西疆域的开拓。甘(治所在今甘肃张掖)、沙(治所在今甘肃敦煌)、伊(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凉(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等州原是河西地区吐蕃、回鹘政权的重镇,夏景宗元昊率兵一一占领。所以藏于滋福殿中的这幅《甘、沙、伊、凉等州图》,其实相当于西夏河西地区专图。

《环庆清远军至灵州地图》是一幅行军交通路线图。《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卷四九之咸平四年(1001)八月戊申条载,“上出《环庆清远军至灵州地图》指示辅臣曰:‘一昨戎人所掠部族,边臣奏不以实。’又指灵州西榆林、大定曰:‘戎人多据此路,凭高以瞰王师。盖恃复远,难于追袭。’复指天涧路曰:‘杨琼尝言此路往灵州,险而有水,可保无患。然将帅顾方略如何耳?’又曰:‘边臣奏粮储刍粟大有备。’”^⑫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真宗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戎人”对灵州的觊觎。果然在不久,处于环州和灵州之间的重镇清远军(遗址在今甘肃环县甜水堡)就被继迁征服。清远军的征服直接为继迁下一步占领灵州铺平了道路。从图名看,《环庆清远军至灵州地图》应该是以古灵州大道为主要绘制对象,灵州大道可以通往夏国各主要的军司和州。所以《环庆清远军至灵州地图》为宋朝制定出兵西夏的行军路线提供了依据。

《河西陇右图》是郑文宝多年实地调查资料的结果。河西主要指河西走廊,陇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河西陇右地区是宋夏战争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区。《玉海》卷十四《地理·地理图》之《咸平河西陇右图》条载:“《郑文宝传》:咸平中,命相府召询策略,文宝因献《河西陇右图》,且言灵州不可弃^⑬。序曰:‘淳化初,掌漕陕右,周览河陇,遍寻方志,广问象胥,探月支、日逐之穹庐,讨金城、玉关之瓯脱,列于藻绘,焕然在目。’”^⑭从《河西陇右图》的序文来看,它大概是一部图、文结合的地理书,而且地图还很可能有彩绘的。郑文宝搜集河西、陇右地区的地理资料以实地考察为主,同时,他也注意

搜集与当地民族的历史地理有关的各种史书传记和方志,结合这些文献中的记载来考证该地区的历史地理。郑文宝注意从当地人那里获取直接的资料,这样形成的最终考察结果可信度是很高的。

刘昌祚所献《鄜延边境图》具有显而易见的军事目的。刘昌祚一直战斗在抗夏最前线,熟悉边地形势。《玉海》卷十四《地理·地理图》之[元祐]《职方图》条载:“元丰六年七月壬申,知延州刘昌祚以鄜延边面东自义合西至德静,绵亘七百里,堡寨疏密不齐,烽燧不相应,乃立为定式。凡耕垦训练、战守屯戍,度强弱,分地望,图山川形势上之。上嘉纳。”^⑤宋鄜延路位于今陕西北部,与西夏的夏、银、绥、宥、石、盐、龙等州相邻,宋夏两国边境堡寨在此犬牙交错,宋夏永乐城之战就发生在这里。从总的形势来看,鄜延边境地区的情况很不利于宋军的防御。宋人范雍曾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他正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宋史》卷二四八《范雍传》载范雍之言曰:“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而贼出入于此,请益师。”^⑥但他请求增兵的建议没有被上报。元昊建国前,就开始对宋西北边境作试探性的进攻。经过几年时间,基本摸清了宋沿边各地的防御情况,最终选定鄜延路为攻宋的突破口。刘昌祚绘制了详细的鄜延路边境图,有明显的抵御西夏侵扰的军事目的。

四、传世的西夏地图文献

传世的宋朝各地图中对西夏国疆域的标注位置基本一样,在西夏国疆域内标注的地理要素也都基本相同。传世的宋朝地图一般都绘有黄河。除了《禹迹图》之外,还都绘有长城。在宋朝地图上,凡附带标绘出西夏国疆域的,其疆域位置都无一例外地标绘在黄河大“几”字的左边,靠近古长城的西北段外侧,也就是黄河中上游附近,基本符合历史上西夏国实际的疆域位置。图中标注的地理要素包括了西夏国重要的州、山脉、河流。州的标注,沿古长城西北段

外侧一线,从西北往东南这一走向的州包括银、夏、宥、盐、灵、兰、会等,河西走廊一带自东往西标注的州包括甘、凉、瓜、沙、肃、廓等州。图上标注的山有朵朵山、积石山、贺兰山、祁连山、三危山、焉支山、合黎山,标注的河有黄河、鄯河、弱水、湟水等。不同的地图在标注上述地理要素时会略有增减。很显然,由于是附带标绘西夏国,所以传世的宋朝古地图中标绘的西夏地理要素不是西夏地理要素的全部。

(一)《华夷图》和《地理图》中的“党项夏国”

在中国古代地图中,最早明确标注出西夏国国名及其地理位置的是《华夷图》,图中明确标注出西夏国的国名为“党项夏国”。从所标注的西夏国的地理位置看,大致在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所在的位置,这里曾是西夏国都城兴庆府的故地,标注是基本准确的。地图还在“党项夏国”国名位置的左上方标注了补充文字,简明概述了夏国叛服之经过:“夏国自唐末拓跋思慕赐姓李氏,宋端拱初,赐以国姓,至宝元元年元昊始僭号。”按,此段文字中的“慕”字显系“恭”之误字。其它地理要素的标注如前所述。

宋人黄裳绘制的《地理图》中,也标注出了西夏国的地理位置。从标注的西夏国名称和方位看,和《华夷图》所标注的基本一致,只是没有补充说明的文字。

(二)《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夏”及“夏国”

《历代地理指掌图》,旧题苏轼著。图中对西夏国所在位置的标注始终没有变化,大致都是标注在今宁夏银川市一带。图中标注的西夏国地名有丰、夏、银、宥、盐、会、灵、甘、凉、瓜、沙、肃、廓、萧关等,另外还有祁连山、三危山、焉支山、积石山、贺兰山、无定河、弱水等山河名。通过对其中若干地图及其说明文字的梳理,我们可以大致考辨出西夏国由夏州地方政权“夏”演变为独立王国“西夏”的过程。

《历代地理指掌图》的第一幅地图《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在西

夏国所在的地理位置上标注有“夏国”两字，西夏国显然属于图名中提及的“夷”了。在地图的说明性文字《辨古今州郡区域》中记曰：“辨夏国：夏国自唐来拓跋思恭赐姓李氏，本朝端拱初赐以国姓，至宝元六年元昊僭窃。”按，此段文字中的“来”显系“末”之误，“六”显系“元”之误。在《东晋中兴江左图》中，西夏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处标注有“夏”一字，说明文字曰：“夏，赫连勃勃都今夏州。”在《元魏北国图》中亦在同样的位置标注有“夏”一字，说明文字曰：“夏，赫连勃勃。”另外还提到，“统万城，今夏州。”在《唐十道图》中，西夏国所在的位置标注为“关内道”，说明文字里提到了羁縻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在《后唐及五国图》中，西夏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处标注有“夏”一字，说明文字曰，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称留后。……末帝清泰二年，夏州李彝超卒，弟彝兴立。”在《太宗皇帝统一之图》中，西夏国所在位置未标注出西夏或夏的字样，说明文字曰，太平兴国“七年，得西夏李继捧银、夏州。”尽管这五幅地图标注的地理要素及其说明文字提供的地理信息非常之少，但我们可以看出，宋朝人对西夏国正式立国前的政权更迭情况是比较清楚的。

在《圣朝元丰九域图》中，西夏国所在地域标注有非常醒目的“西夏”二字。在这幅图的说明文字中，对西夏国的沿革作了较为详细地说明：“西夏，自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有拓跋仁福者，为蕃部都指挥使，从其姓。梁开平中，将吏迎立仁福为州帅，子彝超、彝兴继为帅。世有夏、银、绥、宥之地。彝兴仕周，为定难军节度、太傅中书令，封西平王。其后光叟、继筠、继捧相次承袭。然自祖宗以来，服叛不常。朝廷易其小寇，不即讨除彼盗有之地，故《元丰九域志》列之为化外云。”这段文字非常简明地介绍了西夏立国前夏州政权的传承情况，另外这段文字记载也说明了宋朝最初还没有意识到西夏国的存在对宋朝将会产生怎样影响，还没有意识到西夏国崛起对宋朝潜在的威胁，宋朝对西夏所在地

区还无意疆理,仍然想沿袭唐朝的羁縻政策,以地方酋豪中为众所服者做地方长官,以州邑封之,并许其世袭。但事实表明,这样的政策对西夏地区是不适应的。

(三)《东震旦地理图》和《契丹地理之图》中的“西夏”

《东震旦地理图》附在宋人志磐编修的一部佛教典籍《佛祖统纪》卷三二《天台统纪》里。图中在西夏国所在的地理位置上没有标注出西夏国的国名,但原夏州政权所统治地区的地理要素都有标注;标注的州名、山水之名和《历代地理指掌图》中标注的基本一样。

《契丹地理之图》附在南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的卷首。在《契丹地理之图》上,夏辽交界地带的西夏一侧仅标注有“党项”、“西夏”四个字,其他任何与西夏相关的地理信息都没有标注。

五、俄藏手稿本《西夏地图》册及《西夏地形图》

传世的西夏地图文献数量很少,虽然在《华夷图》、《地理图》、《历代地理指掌图》、《东震旦地理图》、《契丹地理之图》等地图中都有对西夏地理信息的标注,但内容非常简单。含西夏地理信息最为丰富的地图是俄藏《西夏地图》册和《西夏地形图》。

(一)西夏地图

法国学者伯希和在1932年发表的《俄国收藏之若干汉籍写本》一文中提到,他曾考证过藏于俄罗斯的清人手稿本《西夏地图》^⑧,它是传世的汉文古地图中唯一一册西夏专题地图。1958年4月17日,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发表了《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的报告^⑨,对伯希和见到过的西夏地图作了简略地介绍。报告后附录了《西夏地图》中的一幅半地图,即完整的《西夏地形图》和《西夏疆域总图》的前半幅。在其博士论文《唐古特国家史纲》中^⑩,他完整地转录了《西夏地图》册中的四幅地图,即《西夏疆域总图》、《夏东与宋五路接界图》、《夏东北与契丹接界图》

和《西夏地形图》。俄罗斯收藏的手稿本《西夏地图》册的全部内容还没有公布,根据克恰诺夫的报告,结合已经公布的地图和中国古籍固有的特点及有关的研究论文,对于俄藏《西夏地图》我们可以做如下的介绍。

《西夏地图》一册,手稿本,线装19页^②,绘制者不详,地图绘制时间当在清朝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间。全册共有地图13幅,有图题的地图共12幅,第13幅即《西夏地形图》,原图没有图题。据各图图题推测,《西夏地图》是一部以西夏国地理为绘制主题的地图集,绘制的地图包括西夏与陕西五路交界地区边境堡寨详图,还有西夏与契丹政权交界图,《西夏疆域总图》、《夏东与宋五路接界图》、《夏东北与契丹接界图》和《西夏地形图》属于总图性质,其他则是局部的详图。前12幅地图都采取计里画方的方法来标注西夏国和宋朝陕西五路以及契丹政权交界地区重要的州城堡寨,在地图的右侧竖行大字标明图题,图题下用小字注明“每方多少里”的字样。前12幅地图上都有双线勾画的大几字形的黄河,在黄河内外不同的地方绘制出西夏国重要的州城堡寨。这些州城堡寨除用文字注出地名外,还用黑点、圆圈、黑三角、白三角、白四方形和黑四方形等不同的图形符号来标注其具体位置,这样可以利用该图的比例尺即“每方多少里”来精确测量各地之间的距离。有些还注明西夏地名在当时(即《西夏地图》绘制时期)的变化,以便于了解其历史沿革。有的地图在空白处还有考证性的文字说明,以帮助用图者补充了解原图反映的地理信息。为避免和《西夏地形图》中反映的地理信息相重复,《西夏地图》前12幅地图主要以绘制西夏国政区为主,对西夏国的山川地理、道路交通等情况不再涉及。

(二)《西夏地形图》

国内曾有学者根据克恰诺夫公布的材料来研究《西夏地形图》,就该图的成图时间及绘制者等问题进行过探讨,但没有形成

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传世的《西夏地形图》,最重要的版本有三种,它们分别收录在《宋两名相集·宋文正范先生文集》、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卷首和俄藏手稿本《西夏地图》册之中。这三幅《西夏地形图》中,成图时代最早的一幅是收录在明刻本《宋两名相集》中的那一幅(下文简称作“明图”),俄藏手稿本《西夏地图》中的那一幅(下文简称作“俄图”)直接转绘自明图,而《西夏纪事本末》中的那一幅(下文简称作“清图”)也源自明图,但有些地方略有改动。学者对《西夏地形图》绘制的内容及其研究价值讨论得已经很充分了,在此笔者仅就其流传及成图时代等问题略作探究。

《西夏地形图》的流传情况很复杂。据笔者考证,传世的《西夏地形图》,成图时间最早的一幅出现在明朝康丕扬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刊刻的《宋两名相集·宋文正范先生文集》中,国家图书馆藏有该文集。《宋两名相集》是韩琦、范仲淹诗文的合刻本,国图藏《宋两名相集》仅存有范仲淹的文集,《西夏地形图》收录在《宋文正公范先生文集·遗事》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朝毛九苞受康丕扬之命重修的、刊刻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重修范文正公集》,从其目录看,在毛九苞刻本的附录中有《陕西五路之图》、《西夏地形图》和《西夏堡寨》。可惜北大所藏范仲淹文集为残本,《陕西五路之图》、《西夏地形图》和《西夏堡寨》仅存目,毛本是否对康本所录地图的内容作过改动就不得而知了^②。

对比明图、俄图和清图,我们发现了以下差异。(1)明图标示的方向只有南、北,俄图和清图补全了东、西。(2)明图中有些地名用字使用了俗体字或简体字,如所有地名中的“寨”字,清图和俄图都写作“砦”,“啰”字在清图里都写作“囉”,在俄图里都写作“羅”。明图中“國信驿路”之“國”写作“国”,“定邊寨”、“安邊寨”之“邊”写作“边”,“觀化堡”之“觀”写作“观”,“萬全寨”之“萬”写作“万”。(3)明图标示的有些地名出现了明显的错字,如“無定河”写作“光定河”,“乳井驿”写作“乱井驿”,“兔盧张”写作

“免盧张”，“玉门关”写作“土门关”。(4)明图中还有一处漏字现象，在“凤凰城”旁注的补充说明文字中，“一名莲州”的“一”字遗漏了。这些错误在清图中都被改正过来了。当然也有明图不误而清图改误的情况，如明图中的“葫芦河”清图写作“葫羅河”。(5)在地名的标注上，明图和清图也有一些不同。如明图在“观化堡”和“洪德砦”两地名中间，有明显的一个字的间距，清图却没有。明图把“前石门口”标注在“灵武山”的东北方向，把“后石门口”标注在“灵武山”的西北方向，而清图却将两处山口全都标注在“灵武山”的东北方向。明图在“瓜州”地名之下标注有九个字，两竖行，右行五字，曰“一名玉门县”，左行四字，曰“下都普昌”，其中“昌”在“普”之左，两字横写，“瓜州”之右标注有地方名“神城”。清图在“瓜州”之右标注的地方名“神武”，在“神武”之下标注四个字，两竖行，每行两字，曰“一名下都”，在“一名下都”之下标注有五个字，两竖行，右行三字，曰“玉门县”，左行两字，曰“普昌”。

明图中的有些错误则被清图承袭。如晋宁军误作普宁军，韦州旁注“本咸州”当为“本威州”。这很可能是辗转传抄地图的过程中，造成字的形近而误。另外，两图中在灵州境内都标有一处叫“分山口”的山口名，其下标注为“夏贼犯边之路”。笔者认为，此“分山口”很可能是“岔口”或“两岔口”之误。《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载：“谅祚，景宗长子也，小字宁令哥，国语谓‘欢嘉’为‘宁令’。两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从元昊出猎，至此而生谅祚，遂名焉。”^②从《宋史》本身对谅祚小字的释义来看，小字应该是叫“宁令两岔”。为纪念谅祚诞生在两岔河，所以取名中有河名。这样的小字才符合《宋史》对小字的解释。《西夏地形图》上，在“分山口”左旁标注“宁令口”，取名“宁令口”，很可能是为了纪念西夏毅宗谅祚的诞生，所以笔者以为“分山口”之“分山”二字，很可能是在地图的传抄过程中，将“岔”字上下结构的距离拉大，分开竖写成了“分山”，这样，原本是河名的“两岔”慢慢讹变成了山口名了。

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清图和明图编绘的地理信息完全一样,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两图中存在的差异是转录者在转录过程中人为造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后出的清图的确是原本于明图的,所以张鉴所言《西夏地形图》本于《范文正公文集》的说法是可信的。至于俄图和清图之间的异同,已经有学者做了详尽的比较分析,结论是:“这两幅地图应是出自同一个来源,是同一幅西夏地图的不同抄本。”^②

断定《西夏地形图》具体的成图年代是非常困难的。有学者认为,张鉴所附之图并不是源自于范仲淹文集,而是由清人绘制,托名宋人所作^③。但也有学者认为,此图当是宋代官吏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绘制的^④。克恰诺夫则认为此图绘制于宋英宗治平三年至神宗元丰四年(1066—1081)之间^⑤。

我们认为,《西夏地形图》成图年代的断定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首先,检索书目和其他相关文献,寻找能断定该图成图年代的有价值的材料。查找出最早提及或者收录有《西夏地形图》的文献,从分析该文献的成书时间或者该文献编著者的生卒年月入手,推断地图最早在什么时代就已经有流传了。前文已经提到,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来看,《西夏地形图》最早出现在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刊刻的《宋两名相集》中,但康丕扬不是最早刊刻范仲淹文集的人,他在《宋两名相集序》中说:“予乃采两公旧集,并所常辑诸奏疏及传、表、杂志共成一书。”这说明康丕扬在刊刻范氏文集时也是有所本的,在他所本的范仲淹文集里是不是就已经有了《西夏地形图》了呢?其他明人刊刻的范氏集子里又如何呢?另外,宋朝就已经有人刊刻范氏的集子了,这些集子里会不会早已收录有《西夏地形图》呢?元朝也刊刻有不少范氏的集子,这些集子里会不会有呢?如此看来,《西夏地形图》最早的成图时间在宋、元、明三朝均有可能,且至迟不会晚于1608年。

其次,结合其他地理文献,分析地图中反映的与西夏相邻的政

权的地理信息,进一步确定理论上的成图年代范围。《西夏地形图》以西夏国地理及宋夏边境堡寨为绘制重点,标注的内容较为复杂,对西夏周边其他政权地理信息的标注相对简单一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周边地区的地理信息来判断地图所绘之西夏地理信息大致是什么时期的。从西夏国北部边界相邻之政权是“契丹”来看,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1125年被金朝所灭,所以《西夏地形图》反映的地理信息至晚应当是辽朝灭亡以前的,这相当于西夏崇宗乾顺时期(1086—1139)。

第三,西夏疆域在乾顺时期已经非常辽阔了,但在《西夏地形图》标注的西夏诸州中,却没有西夏初期就曾设置的胜、绥、龙、会等四个州,从现有文献中也找不到西夏废此四州的线索,但有这四州被其他政权占领的史料,这就有了一种可能,即在绘制《西夏地形图》时,这些州已经不属于西夏了。史载:1043年,辽伐夏,占据了胜州;1067年,宋将种谔取绥州;1099年,宋收复了会州;1104年,宋占领了龙州。这样,《西夏地形图》的绘制时间最早应该是在1104年以后了。

第四,对地图上标注的宋夏各州郡堡寨的设置时间逐一梳理,以确定最晚设置的时间。这样,也可以断定该图在理论上的绘制时间最早会在什么时候。永和寨是《西夏地形图》上标注的西夏堡寨中最晚被宋朝占领的,所以从理论上讲,《西夏地形图》绘制时间最早不会早于1119年。结合第三条结论,《西夏地形图》反映的地理内容应该是西夏在1104年至1119年之间的疆域情况。

第五,从宋朝的文献及人物生平来寻找判定《西夏地形图》成图年代的线索。传世的《西夏地形图》是附在宋人范仲淹的文集里,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范仲淹本人绘制的,因为范仲淹卒于1052年,而图中有许多地理信息是此年之后的。另外,范仲淹是一代名臣,他的文集自宋至元有很多版本传世,但都无收录《西夏地形图》者,如《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采用的本子是明覆元天历刻本,其中

只有《西夏堡寨》的具体内容,但没有《西夏地形图》。试想如果范仲淹真的绘制了地图,或者在他的文集中有这样一幅《西夏地形图》,肯定会有人提及,但传世的这幅《西夏地形图》在宋元时期从未有人在书目中著录或提起过,而且范仲淹本人也从未述及绘制过《西夏地形图》,这一切都不符合常理。这样,《西夏地形图》成图于宋朝的说法是缺乏有力的文献佐证的。

最后,结合地图本身的绘制特点来加以判断。既然《西夏地形图》成图于宋朝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它很有可能是元明时期的人绘制的了。元朝地图传世者很罕见,不好去对比。由于传世的《西夏地形图》最早是出现在明朝人刊刻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结合明朝地图的时代特点来帮助判断该图是不是明代绘制的。明朝地图中有代表性的是嘉靖年间(1522—1566)罗洪先的《广舆图》,它是根据元朝人朱思本的《舆地图》绘制的。另外在传世的一些明朝万历时期(1573—1620)的地方志书中也附有一些地图,这都有助于分析明朝地图的特点。

综上所述,《西夏地形图》的成图时间不能仅凭图中反映的西夏国地理信息来判断,而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笔者认为,《西夏地形图》最为合理的成图时间不会是在宋朝,最有可能在明朝,具体说是在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宋两名相集》问世之前的某个时间,具体的绘制者现在已不可考。当然,这也只是笔者个人的推测,我们期待着更有说服力的结论的出现。

注:

①(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687页、第10688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第40册,第13988页、第13989页。

④关于这次麟州之围,史书所载多有不同。《宋史》卷六《真宗本纪》载此

事发生在咸平五年六月。同书卷二七九《张进传》载,麟州被围时,州将遣人至太原求援,太原诸将犹豫不决,时任并、代副都部署的张进力排众议,独自发兵,解了麟州之围。两者所记均异于《夏国传》。另《长编》卷五二、《太平治迹统类》卷五《真宗经制西夏》、《宋史》卷六《真宗本纪》所载知州名为卫居实而非卫居宝。

⑤(元)脱脱等:《宋史》,第12册,第3856页。

⑥(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册,第273页。

⑦(宋)王应麟:《玉海》,第1册,第275页。按:“玮”原误作“韦”,“崇”原误作“文”,据《长编》卷七三之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己未条、《宋史》卷二八五《曹玮传》改。

⑧(宋)王应麟:《玉海》,第1册,第276页。

⑨冯继业:原误作“冯业”,同书卷二五《地理·议边》载,“太祖将帅凡十四人,……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戎。”《宋史》卷二五三有《冯继业传》,据改。

⑩按:此段文字原是《玉海》的双行小注,“不”字原脱,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太平治迹统类》卷五《真宗经制西夏》所载,文宝献图,且言灵州不可弃。另考《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可知,他很重视灵州的战略地位,曾精心经营其地。故《玉海》有脱误。

⑪(宋)王应麟:《玉海》,第1册,第271页、第272页。

⑫(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册,第1068页、第1069页。

⑬按:“不”字原脱,参见注释⑩。

⑭(宋)王应麟:《玉海》,第1册,第272页。

⑮(宋)王应麟:《玉海》,第1册,第276页。

⑯(元)脱脱等:《宋史》,第28册,第9679页。

⑰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六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5页、第186页。

⑱⑳(俄)克恰诺夫:《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莫斯科)《东方国家和民族》第一册,1959年,李步月译,《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

㉑(俄)克恰诺夫著:《唐古特国家史纲》(俄文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68年。

②按:原地图册没有标注页码,克恰诺夫在报告中说地图册共有38页,他在报告的第二条注释中说:“页码是用铅笔按欧洲顺序表示的,显然是当初整理手稿时加上去的。”整理者是谁他没有交待,这是俄国整理者把中国古代线装书一叶的前后两个半叶按两页来算之后得出的数据。

③按:黄盛璋、汪前进二先生在其《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一文中,误以为《宋两名相集》是范仲淹、范纯仁文集的合刻本。且言“我们又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找到了这个‘初刻本’,其中的《西夏地形图》与《重校》本中的地图完全一样”,此处《重校》本指的就是北大所藏之《重修范文正公集》,集中《西夏地形图》已阙,黄、汪两先生所言不知何据。

④(元)脱脱等:《宋史》,第40册,第14000页。

⑤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页。

⑥求实:《论所谓复制宋本西夏地图问题》,《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2页至第659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433页至第457页。

⑦黄盛璋、汪前进:《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作者工作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